

论语派作品选

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

论语派作品选

庄钟庆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语派作品选/庄钟庆编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12

(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

ISBN 7-02-002114-X

I. 论… II. 庄… III. ①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③小品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16365 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57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25 插页 1

199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14.70 元

前 言

庄 钟 庆

论语派是因林语堂等创办《论语》杂志而得名的文学流派。

《论语》半月刊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六日创刊于上海，林语堂任主编，因产权纠纷，第二十七期以后由陶亢德接编，不过林语堂仍为实际主持者。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出版至第一一七期因抗日战争爆发停刊。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复刊，一九四九年五月停刊，共出版一七七期。

一九三四年四月林语堂、陶亢德在上海又创办《人间世》半月刊，由于编辑部门与出版部门的意见齟齬，创刊一年多即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停刊。

《人间世》停刊前即一九三五年九月林语堂又与陶亢德、徐讦在上海合办《宇宙风》，初为半月刊，从五十期起改为旬刊。抗战期间一九三七年迁往广州出版，一九四〇年迁至重庆出版，一九四一年又迁至广州，一九四七年八月于上海停刊。

论语派以林语堂为主要代表人物，创办了《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三个刊物。与这些刊物相呼应的有简又文主编的《逸经》半月刊，一九三六年三月创刊，一九三七年停刊。还有海戈（张海平）主编的《谈风》半月刊，一九三六年十月创刊，一九三七年八月停刊。还有黄嘉音、黄嘉德编辑的《西风》月刊，创刊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一九四九年五月停刊。这几个刊物情况不一，如《西风》是以介绍西方文化知识为其特点。

论语派的组成，据林语堂的介绍，是他孕育，并使之出世的，

他又说：“论语地盘向来完全公开，所谓‘社’者，全、潘、李、邵、章诸先生共同发起赞助之谓也”。^①这就是说，论语社是由林语堂、全增嘏、潘光旦、李青崖、邵洵美、章克标几位共同发起并赞助的。可以说论语派是以《论语》等刊物为阵地，以林语堂为核心人物，以编辑陶亢德、徐訏为中坚，以经常撰稿而倾向相似的章克标、邵洵美、全增嘏等人组成的。老向（王向辰）、姚颖等时常为论语派刊物撰文。

《论语》创刊时，林语堂在《答青崖论幽默译名》中说过，该刊以“提倡幽默为目标，而杂以谐谑”，随后，论语派又在《人间世》的发刊词中，提倡小品文，鼓吹“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

从论语派提倡幽默文字到鼓吹小品文，在林语堂看来这两者“相辅而行，互相灌溉”，因为两种文体共同的特点是提倡幽默，他认为小品文即“在人生途上小憩谈天，意本闲适，小品文盛行，则幽默家自然出现”^②。由此看来，林语堂是以提倡幽默文字为己任的。当年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中就专节谈过林语堂提倡的幽默文学。

论语派有关幽默文学的理论，林语堂阐述得最为系统和全面，影响也较大，因之有必要加以介绍。

林语堂在谈及《论语》刊载幽默文字时指出：“有性灵，有骨气，有见解，有闲适气味者必录之”^③。这里提出幽默文学要求具有性灵与闲适的特点。

性灵，可谓幽默文学之命脉，林语堂说：“提倡幽默，必先提倡解脱性灵”，“性灵之解脱，由道理之渗透，而求得幽默”^④。所谓性灵，林语堂说：“性灵就是自我”，或者是“个人之观感”，或者

①③ 见《与陶亢德书》，《论语》第28期。

② 见《又与陶亢德书》，《论语》第38期。

④ 语出《论文（下）》，《论语》第28期。

是“以自我为中心”。他认为性灵即是要说自己所要说的话，所要表示的自己的意，不受“物质环境”所制约。这样才能“思想自由”，幽默文章才能出现。

当时许多革命的进步的作家对于林语堂的“性灵”说提出批评。鲁迅总结历史教训时说：“残酷的事实尽有，最好莫如不闻，这才可以保全性灵”^①，这是嘲笑那些脱离现实斗争高谈“性灵”的人，他们自信鼓吹性灵，那是超然的，而在剧烈的现实斗争中，性灵是有社会性的。鲁迅风趣地说道：清朝性灵派“到得现在，却刚刚相宜”，“有国时是高人，没国时还不失为逸士”，当年提倡性灵者，不过是在做“高人兼逸士梦”。^②茅盾明确指出所谓“性灵”，就是纯粹的“自由意志”，这种主观超然的性灵，“被几根无形的环境的线在那里牵弄”，终究“不过是清客身份”。^③

性灵说主张自我的观感、见解可以不受社会环境的制约，没有社会性，那是不可能的。林语堂不得不承认性灵派是以个人主义为立场的，也不回避自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如他所说的“介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他的性灵说便是以自由资产阶级为立场观点来观察社会人生，指出其矛盾，但不“攻击任何对象，只希望大家头脑清醒一点罢了”。^④

论语派是否定幽默的社会内容的。林语堂在《会心的微笑》中说：“大概世事看得拂脱的人，观览万象，总觉得人生太滑稽，不觉失声而笑。幽默不过这么一回事而已，在此不觉失声中，其笑是无可勉强的”。又说：“有无裨益于世道人心，听他便罢”，他

① 见《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

② 见《且介亭杂文二集·杂谈小品文》。

③ 引自《小品文和气运》，《茅盾全集》第21卷。

④ 引自《我们的态度》，《论语》第3期。

把幽默看成是“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对现实矛盾淡然处之，“不会怒，只会笑”，“常于笑中带泪，泪中带笑”。邵洵美在《幽默真谛》中也认为幽默正像“最悲伤时的‘破涕一笑’”。徐订在《幽默论》中也说幽默是“窘极时候一个笑容”。总之他们都把幽默看成是玩世的，决无严肃的社会内容与实际作用。这当然同他们主张超脱的性灵有关，林语堂在《会心的微笑》中说，幽默的笑声“是出于个人性灵”，“无可勉强”。

许多革命、进步的作家认为幽默是有社会现实内容的。鲁迅说：“用玩笑来应付敌人，自然也是一种好战法，但触着之处，须是对手的致命伤，否则，玩笑终不过是一种简单的玩笑而已”。^①茅盾认为“‘幽默’是可喜的”，然而他反对那笑里带点儿“肉麻”的“油腔”。老舍赞赏萨克莱对于幽默的见解，萨克莱说：“幽默的写家是要唤醒与指导您的爱心、怜悯、善意——您的恨恶不实在，假装，作伪——您的同情与弱者，穷者，被压迫者，不快乐者”。^②吴组缃也说：“叫人一笑了事的幽默却要不得。”

由于人们的社会人生不同，各自性灵也就不同，对于幽默是是否具有社会性也有不同的观点，对于幽默格调也就各有标准。

林语堂认为幽默格调是有不同的，指出庄子是阳性的幽默，其以议论纵横取胜，陶潜是阴性的幽默，以诗化自适著称，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闲适怡情之幽默，不绝见于诗文。^③对此林语堂极为赞赏，他鼓吹幽默文学要以闲适为格调，不无因由。

林语堂认为闲适格调，要求作者“先有深远之心境，而带一点我佛慈悲的念头，然后文章火气不大盛”^④。他认为把“世事看穿”了，无所挂碍，冲淡的幽默，自然形成。这就是说作者必须胸

① 引自《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② 引自《谈幽默》，《字宙风》第23期。

③④ 见《论幽默》，《论语》第33期。

怀宽厚，才能写出闲适的幽默文学。

闲适格调还要求情调自然清淡，林语堂说“情调自然越深远，而越近于幽默本色”。他不赞成“滑稽之炫奇斗胜”，也反对“郁剔之出于机警巧辩”^①。他把滑稽同幽默加以区别，那是对的，可是他把郁剔讽刺视为“酸腐”而加以排除于幽默之外，未必妥当。老舍在《我怎样写〈猫城记〉》一文中说得好：“讽刺与幽默在分析时有显然的不同，但在应用上永远不能严格的分开”，林语堂之所以贬低尖利的讽刺，那是同他鼓吹闲适格调有关，他说讽刺“去其酸辣，而达到冲淡心境，便成幽默”^②。

闲适格调还要求“闲适笔调”，即“个人笔调”。林语堂在《论小品文笔调》中认为此种笔调亦称“闲谈体”、“娓语体”，“笔墨极轻松，真情易于吐露，或者谈得畅快忘形，出辞乖戾”。他还认为笔调是多种多样的，“或平淡，或奇峭，或清新，或放傲”，不过，他极力提倡“味愈醇，文愈熟，愈可赏”。在他看来，闲适笔调，“各依性灵天赋，不必勉强”。

林语堂认为幽默文学的闲适格调从读者感受上说，应是“淡然之味”。他说，“使你于一段之中，指不出那一句使你发笑，只是读下去心灵启悟，胸怀舒适而已”。^③

幽默文学在艺术上要求“谑而不虐”。这就是林语堂所说，幽默“含有假痴假呆之意，作语隐谑，令人静中寻味”。这种诙谐而又宽宏恬静的幽默，在表述方式上应是从容不迫，含而不露。

幽默文学的理论是主张以性灵为命脉，以闲适为格调，以谑而不虐为手段，表露人生的滑稽相。

幽默文学的创作实践是以它的理论为依据的，它具有若干特点。

论语派自称是“旁观者”、“超脱派”，他们以这种性灵为立场

①②③ 见《论幽默》，《论语》第33期。

洞察人间，发表自己的见解。一方面不满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一方面又对革命持否定、非难态度。林语堂在《论政治病》一文中嘲笑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弊病，他写道：“我们的政府比世界上任何政府中较为闭结，脚气、肺癆、痔病、神经衰弱……脑汁糊涂的人物——人人将此病症招示记者赶夜车来沪西上海疗养院‘养痾’去”。《谈言论自由》一文针对当时社会的不自由，指出：社会之存在，都是靠多少言论的虚饰，扯谎。我们所求的不过是有随时虚饰及说老实话的自由而已。

章克标的《进步尚有疑问》议论了无名氏“做了黑牌汽车轮下的冤鬼”的事情，老向的《吾民其为毛人乎》描述了盐官剥削百姓的情状，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国民党治下社会的黑暗；姚颖的《政治上的推与拖》抨击国民党政府长官，说他们“监督不扣钮扣，街上吸烟，随意吐痰等抑甚何严，对于政治上的病态的推拖，反熟视若无睹，殊令人莫测高深。”

论语派嘲笑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采取不抵抗主义政策。林语堂在《如何救国示威》一文中说，国民党所谓长期抵抗，枕戈待旦等等都是能言之成理，只怕不能实行。他嘲讽道：“某将军提出跳舞救国法”，“戴季陶提出筑金光明道场咒救国法”，此等“良剂和合起来，包可百发百中”。他还在《诵经却倭寇》中嘲笑诵经抗日的行径，《等因抵抗歌》说国民党官方叫嚷“薪卧胆尝”、“礼义廉耻”，“理合慷慨激昂，是否打得日本”，“伏维计议从长”。此外他的《国事亟矣》、《梦影》等文也是揶揄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

陶亢德的《“教育前途之展望”》在揭露国民党政府武力镇压学运的同时，也嘲讽对日本侵略者“极其亲善”的行径；老向的《危城琐记》刻划国民党军队在日寇入侵面前“一劲儿往后退”的情景；章克标的《退一步哲学》称日本侵略军到来之前“安全退

出”，即“另一种的抗日胜利”的“退一步哲学”。这些文章从不同方面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

应该指出论语派有关批评国民党政局的文字是比较有价值的，然而我们也要看到论语派还有一些作品嘲笑革命进步力量的。如林语堂在《马克思风》中挖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全增嘏《中国是没有救药的了》奚落人们不满国民党的统治。

对于文化教育界弊病的批评，也是论语派作品中的一个方面的内容。林语堂对于旧教育的批评是很尖刻的，他在《杂说》中揭露学校教育学生“不许用头脑，自作主张”的弊病，嘲笑“凡能意见与先生雷同或书本雷同”的“高材生”，“是教员肚子 里的应声虫”。他还批评博士论文作法与“四马路世界书局、中西书局的作品，大致相同”的格局，指出此为旨在于“敷衍成书卖钱”。因为“没有一本作品精彩，也没有一本特别坏”，其弊病在于缺乏创造性；《涵养》一文指斥旧教育“标举涵养二字”，其“含义注重忍辱负重，和平达观，喜怒不形于色，不轻易得罪人，不吃眼前亏，聪明的计算等”，他对这种种劣根性作了批评。

林语堂对封建文化的揭露是有力的，他在《半部韩非治天下》中说，“若不速速多设圈套，安放官僚，道德仁义再讲一千年，散沙仍是散沙，私人不会减少，公民不会加多，道德仁义之为害实大矣哉。”这里清楚地指出：封建道德的虚伪与官僚的作恶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在《梳、篦、剃、剥及其他》一文中又进一步指出官僚利用封建文化的恶果，他说：“中国之官，只是读书土匪。中国文化之溃灭，及读圣贤书之人之可杀，已充分暴露。”

论语派有一些作品是批评社会上不良倾向的。林语堂的《怎样写〈再启〉》借对信末的“再启”的议论，指出人们的交往中虚饰的风尚；还有他的《冬至之晨杀人记》嘲笑托人拉关系以发表文章终于扑空的窘境。章克标的《遗忘》及《退一步哲学》两文，分别

批评事后一概遗忘不加思索的习性及逆来顺受的耐性等毛病。

论语派不少以轻松笔调抒写个人感受的作品，充满闲适气
味，脱离现实斗争。林语堂自己也承认写作信手拈来，“西装也谈，
再启也谈，甚至牙刷也谈，颇有走入牛角尖之势，真是微乎其微，
去经世文章远矣”。^①《论西装》、《怎样买牙刷》、《论握手》等均
属“苍蝇之微”的作品，这类充满“闲适”情趣，不含人间烟火的作品，
贻害不浅。

论语派作品的幽默艺术有其可取之处，林语堂说他们所提
倡的幽默是“专说实话，要寓庄于谐，打破庄谐之界线”（《答平凡
书》），林语堂一部分作品确实是庄谐结合自然的。例如《脸与法
治》中记述某年上海市长坐飞机，脸面太大，硬要载运磅量过重
的行李，机师碍于市长的“脸面”只好同意，不料飞机碰着船桅而
跌下，文章嘲弄道：“市长结果保全一副脸，却失去了一条腿”，这
里生动地刻划市长依靠权势及其下场的丑态，可谓庄谐融合。
《得体文章》谈及国民党三中全会闭会宣言时说，“说它好，是说
它拟得很得体，面面俱到”，人说它不好，“因为应该说的都说了，
所以读者读了犹如未读”，作者以幽默的笔调嘲弄宣言八股味
重。从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出幽默的色彩同社会批评结合起来，
是富有艺术感染力的。

论语派还善于撷取中西生活中类似现象入题，饶有兴味，且
引人思索。林语堂许多文章都具有这个特点，如《上海之夜》列举
“东西浊流的总汇”，表现旧上海的“浮华、愚陋、风俗与平庸”；又
如《得体文章》比较中西写信不同习惯，旨在批评“在谈话上做八
股，宣言上叙寒暄”的弊端；还有《萨天师与东方朔》通过尼采作
品中的萨拉图斯脱拉与东方朔的对话，揭露“贤人君子”的真面

① 见《我的话·序》。

目。

从生活现象引出意蕴,这也是论语派又一特点。姚颖的《京话》、《变风》等类文字,侧重于从政治方面入手;老向的《柳芽儿和榆钱儿》、《扫帚》等文偏于从日常生活中破题。各人文风不同,前者笔触直露,颇为锋利,后者娓娓道来,蕴藉辛辣。

论语派许多作品行文“不为格套所拘,不为章法所役”(《论文(下)》),可谓信笔写来,随意而谈,又是顺理成章。如林语堂的论说体《论政治病》、抒情体《上海之歌》、书信体《答平凡书》、杂文体如章克标的《谈风月》、陶亢德的《国难不难》,记事体如老向的《换一换年头儿吧》等,这些作品几乎无一固定格局,各有特色。

不少作品有幽默之名而乏幽默之实。论语派有些作品确实有幽默感,但“内容实非幽默,文多平平”^①的也很多,甚至有不少“油滑、轻薄、猥亵”之作,也都举幽默之号。难怪鲁迅说:“上海幽默已稍褪色,语堂转而编小品文”^②,小品“为林公语堂所提倡”^③,但去“‘幽默’或‘闲适’之道远矣”^④。

论语派的文艺理论与创作实践,表明它是自由资产阶级文艺流派,从政治上说,它是属于中间派,既同国民党反动派有一定矛盾,又同无产阶级革命派存在矛盾。从文艺观上说,林语堂一类人虽然在口头上提出文艺是主观超然的性灵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自由资产阶级的文艺,他们既反对封建主义的卫道文艺,也非难无产阶级革命文艺。

论语派的出现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三十年代,以国民党反动派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动势力

① 见鲁迅致陶亢德(一九三四年四月一夜),《鲁迅全集》第12卷。

② 见鲁迅致台静农(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二夜),《鲁迅全集》第12卷。

③ 见鲁迅致台静农(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八夜),《鲁迅全集》第12卷。

④ 语出《花边文学·小品文的生机》。

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革命力量在剧烈的斗争中，自由资产阶级既不满反革命势力，而又畏惧革命力量，便企图在这两种对峙势力的肉搏中走所谓中间道路。林语堂自称对“普罗、法西(斯)之争”不予过问，采取“旁观者”的态度，只指出社会矛盾，不表明爱憎倾向，可谓“超脱派”。不过，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中间派也会发生变化的，或者向左，或者向右，林语堂一类人是向右转的。

论语派的形成是有其文学上的原因的。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各种资产阶级文学流派也纷纷出现，有的公开对抗，反对革命文学，有的则采取中立态度。林语堂等人当时从“五四”新文学阵营中脱离出来，既不愿投向左翼文学阵营，又没有卷入公开反对革命文学的资产阶级文学集团之中，于是联络一些文学上所谓中立的人，打起幽默文学旗号，组成文学派别。

论语派的形成同接受儒家思想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有着不可分离的关联。《论语》创刊号“编辑后记”说该刊的“格式内容里也和孔夫子的《论语》差不多”。林语堂在《沙蒂斯姆与尊孔》一文中说：“儒教为安邦定国之道”。论语派赞扬孔丘的“中庸之道”，他们说我们班人自知没有这种“挽既倒之狂澜，跻国家于太平”的能力，只好出《论语》表示对于世道人心的态度，不敢极口呼冤，只有发出“会心的微笑”。林语堂在《自传》中说，他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态度“具有基本同情”，他非常赞赏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那种“仁慈、诚恳而真实的生活”。他认为自己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他还说，他的“头脑是西洋产品，而他的心却是中国的”。换句话说，他用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观念来考察中国文明，并力求两者结合。《论语》的文化思想便是如此。

论语派的幽默文学的形成，同中西古代文学的交汇有关。

林语堂在《新旧文学》一文中自称他对英国散文始祖乔叟、散文大家绥夫特、小品文鼻祖爱迭生等人或浑朴、或清新、或尖刻的散文颇为赞赏，因为他们的散文都“含有幽默意味”。应该指出这些作品“幽默意味”，是他所鼓吹的幽默文学的因素之一，他对乔叟为代表的英国散文中闲谈体一派作家称颂备至，他说此派“行文皆翩翩栩栩，左之右之，乍真乍假，欲死欲仙，或含讽劝于嬉谑，或寄孤情于幽间，一捧其书，不容您不读下去”^①。林语堂喜爱的闲谈笔调同以乔叟为始祖的闲谈笔调的英国散文作家的影响不无联系吧！不过他对乔叟、绥夫特、爱迭生等人作品的讽刺特色并不感兴趣，难怪他不赞成幽默与讽刺的结合。明袁中郎提倡性灵文学，那是出于反对复古派文学；而论语派鼓吹性灵，则是对“五四”以来革命文学的否定。他认为性灵派文学“足做新文学的南针”，袁中郎是从关心世道出发去提倡性灵的，而林语堂却是从“超脱派”观点去鼓吹性灵的，泾渭分明。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明清性灵派闲适气味对于论语派的影响。

论语派的出现同新文学发展有一定的联系。早在二十年代中期，作为新文学运动中一员的林语堂就热心于提倡幽默文学，他在《晨报·副刊》发表过《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幽默杂话》等文章，主张：“幽默愈幽默而愈妙”，提倡“幽默”、“轻松”的情调，然而并没有得到热烈的反响；三十年代初，他在超然的文学观支配下，大肆地鼓吹幽默文学，由于当时社会条件、文学潮流的关系，他的幽默文学主张得到呼应。

论语派的幽默文学同周作人提倡的“小品散文”有着直接关系。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一文中说，“五四”时期周作人曾提倡过“小品散文”，“这一类的作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

^① 见《小品文之遗绪》，《人间世》第22期。

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个评价，并非完全符合事实，我们并不认为当时周作人的平淡“小品散文”都有“深刻的意味”，其中不乏含有消沉情绪的意味之作。大革命失败后，周作人鼓吹“闲适小品”，他在《燕知草跋》中说“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小品文所合成”，现代的新散文应是这两者“合成的道路”。林语堂在《新旧文学》中说，周作人“把现代散文溯源于明末之公安竟陵派”，“所以现代散文为继性灵之遗绪，是恰当的话”。因之，难怪当年有人说林语堂是沿袭周作人的小品文理论而想加以光大的。^①

论语派幽默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现象，认真总结它的得失，很有裨益。

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对于论语派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于今仍经得起检验。鲁迅认为幽默文学的出现，乃是这派作家“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来”，“但其中单是为笑笑而笑笑的自然也不少”。他还指出幽默文学脱离了社会斗争，必然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②，所谓“闲适”“性灵”情趣的小品文，其实是“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③。茅盾认为“个人笔调”是和“性灵”无关，而为各个人的环境教养所形成，所产生，他说“性灵这微妙的东西，不幸‘性灵’始终不肯和我打交道”^④。钱杏邨说幽默文学的作家面对现实，“打硬仗既没有这样的勇敢，说无意思的笑话会感到无聊，其结果，就走向了‘幽默’一途”^⑤。胡风也指出林语堂的“幽

① 参阅林木斋《小品文杂说》，载陈望道编《小品文和漫画》。

② 见《伪自由书·从讽刺到幽默》。

③ 见《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④ 引自《速写与随笔·前记》，《茅盾全集》第21卷。

⑤ 引自《现代十六家小品·林语堂小品序》。

默”已由“对社会的否定走到了人生的否定”^①。

鲁迅等革命、进步的作家对于论语派的幽默文学产生的社会根源，以及发展趋向及其消极作用都作了客观的评论。他们都把同论语派的论争，作为一种思想斗争，着重严厉地批评它逃避现实斗争，起着麻醉人民斗志的消极作用。然而解放后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有些论著却把论语派作为反动文艺加以全盘否定，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粉碎“四人帮”后许多论文对论语派作了重新评价，逐步恢复本来的历史面目，这是完全必要的，我们认为还要作进一步探索，以求全面地给予评价。

论语派决不是反动文艺派别，它同国民党反动文人提倡旨在为国民党反动派服务的民族主义文学是有区别的，民族主义文学是“官办”的反动文艺，而论语派幽默文学是由一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人提倡的文学，鼓吹主观超然的性灵文学，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文学。论语派文人对剧烈的现实斗争，采取中间派的立场，属于自由资产阶级的。论语派的幽默文学主张，可以肯定的是它提出文学作品需要幽默，并把幽默解释为“谑而不虐”，同时提倡取材广泛，体裁多样化等等，可是它鼓吹“性灵”、“闲适”及“恬静幽默”等都是不足取的。在创作上可以肯定的一类是有现实意义的，二类是与现实无害与生活有益的，然而不少作品却是“小摆设”，其中不乏有害之作。总起来说，论语派的幽默文学的理论与创作，有一定积极作用是不能否定的，然而，不少消极作用也是应该指出，并加以批评的。

任何脱离时代、脱离人民的文学流派，终究是没有前途的。论语派的命运又是一个例证。当年论语派鼓吹幽默文学，文艺界曾给予劝导，然而他们不听有益的批评，越走越远。正如鲁迅所说：“语堂在牛角尖里，虽愤愤不平，却钻得滋滋有味，以我的

① 语出《林语堂论》，《文学》第4卷第1号。

微力，是拉他不出来的”。^①论语派受到当年文艺界的批评，其影响受到一定的削弱，然而仍有余音。一九三六年创办的《逸经》、《谈风》即可证明，这些刊物的负责人思想倾向、艺术趣味都同论语派有联系，然而它们的命运并不长久，林语堂一九三六年到美国后同《论语》等刊物没有联系了。一九三六年创刊的《西风》，起初同林语堂有些联系，后来也没有往来了。一九五二年林语堂在美国创办了《天风》杂志，意欲重振《宇宙风》的遗风，仅在美国、台湾等处销售若干时日，不久即停刊。论语遗音，虽不绝如缕，然最终还是绝响。这些事实表明，文学脱离时代、脱离人民，将会被时代、被人民大众所抛弃！

论语派所提倡的幽默文学，已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陈迹。当我们回顾它的历史过程时，我们不应抹煞它曾有一些积极作用。然而也应该看到它严重的消极倾向。从历史的经验中，我们应该引出这样的结论：文学流派只有与人民的命运，社会进步相结合，才有强大的生命力。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更是如此。否则，即使鼓噪一时，也是要沉沦下去。历史就是这样无情！

本书选文力求体现论语派作品的特色，择取好的或较好的篇章，至于为数不少的“逃避现实”的“闲适”之作，当然极少选入。

选文参阅我与庄明萱、孙立川合作编选的《论语派资料》初稿，此书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此外还参照了有关选本。

在编选的过程中，曾得到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我的老师万平近同志的指点，也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同志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欢迎读者、专家的批评。

1988年5月初稿

1994年5月改定

^① 见鲁迅致曹聚仁（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三日），《鲁迅全集》第12卷。